

劉知幾與唐代的書和手抄本： 一個物質文化的觀點*

賴瑞和**

摘要

本文探討唐代的書和手抄本的若干細節，以史官劉知幾的生平經歷為重點，藉以更深入去理解他當時的寫本文化。細考了劉知幾自傳中所提供的一些例證，本文達致了幾個結論。第一，唐代皇家的藏書，固然是卷軸式，但民間日常用書，很可能是以散葉（而非卷軸）的形式存在。第二，正如劉知幾自述，他當時所能得到的書，「多因假賃」，而「部帙殘缺，篇第有遺」。這表示，唐代民間抄書，受限於人力物力，常屬選擇性的抄寫，抄得不完整，以致有「缺」有「遺」。第三，劉知幾家中的藏書，特別是比較稀見的「皇家實錄」，可能跟他從祖父劉胤之曾任宮中史館史官有關連。第四，劉知幾本人青年時代讀書，書籍的取得不易，單靠家中藏書絕對不足，所以他要「公私借書」，才得以完成他以後的史學大業。他家的仕宦背景和他從祖父任過史館史官所建立的人脈關係，使他佔有不少「物質優勢」，不單可以向許多「私」家借書，還得以向藏書豐富的「公」家皇室圖書館借書。

關鍵詞：劉知幾、唐寫本文化、唐代藏書、知識生產

* 本文原先在2010年12月21日，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的「唐代文史研究的新視野：以物質文化為主——紀念杜希德國際研討會」上宣讀。感謝陳珪兄當年的邀約，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詳細的意見。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小序

將近三十年前，在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剛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跟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老師初習唐史時，他除了送給我一篇他的文稿“Liu Fang: A Forgotten T'ang Historian”（柳芳：一個被遺忘的唐朝史家）之外，還建議我去細讀洪業（字煨蓮，英文名 William Hung）老先生的兩篇英文論文。我後來才知道，這兩篇論文大大有名，對歐美的學者影響極大，發表至今雖然都已超過四十年，但直到現在卻還沒有類似論著可以取代。一篇是洪公英譯劉知幾那封著名的「辭職信」，也就是他寫給宰相蕭至忠的那封信（收在《史通·忤時篇》），題曰“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9 (1969)，附有洪公極詳細的注釋。另一篇則是洪公論述唐 708 年之前的史館，題曰“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3 (1960-61)。這是我初次驚識洪公深厚、細膩的史學功夫。從此，每當有人提到劉知幾，我總會想起杜公當年的推薦閱讀和洪公這兩篇英文論文。

最近，因著某個機緣，我突然需要重溫《史通》，重考子玄的生平官歷和他的史館史官身分，¹ 不知不覺闖進了唐代史學史的領域，也就是杜公晚年的研究領域。他探討過唐代史料流傳和編修的種種問題，成果見於他的最後一本專書《唐代正史的修撰》（*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1992）。現在，我步杜公後塵，寫了一篇涉及唐代史學的論文，詳考唐朝一個史官和他那個時代的書與手抄本。如果杜公在世，我應當可以把本文送請他評點。他應當會給我一些專家的意見。可惜他已過世多年。而今，我僅能把本文呈給一個紀念他的研討會，一面懷緬往事，一面嚮應大會主題。

本文在研討會上宣讀後，陳弱水教授和田曉菲教授給我提了

¹ 這是我2010年11月23日，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的「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漢學典範的轉移」研討會上，所提呈的另一篇論文〈唐劉知幾任史館史官的使職身分〉。

非常寶貴的修訂意見，特此致謝。

一、前言

過去我們研究劉知幾和《史通》，涉及他的生平著述和思想，但似乎還沒有人研究過劉知幾與唐代書籍和手抄本的關係。我們不要忘了，書是物質文化中的重要物品。為了配合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我想從一個物質文化史的觀點，從唐代書籍和手抄本的角度，來觀看劉知幾這個史官在少年和青年時讀書生活的一些細節。

第一，先看他的成長，看看他在少年時期，如何得讀各種歷代史書（甚至他當朝的「皇家實錄」）。他是怎樣享有這種優越的物質生活？第二，看他約二十多歲考中進士後，如何像他在《史通·自敘》中所說，「旅遊京洛，頗積年歲。公私借書，恣情披閱」。²這種「公私借書」的環境為何？其物質條件是什麼？

換句話說，本文要討論的，主要牽涉到劉知幾讀書生活上的一些細節，也就是他跟唐代書籍與寫抄本的種種物質關係。過去，研究劉知幾的學者當然深知，他少年時熟讀各種史書，但他所讀的這些史書來自何處？當時的史書長什麼樣子？這些問題據我所見，好像都沒有學者探討過。他青年那段「公私借書」的事，也廣為人所知，但他到底跟誰「公私借書」？當時「借書」的條件為何？也從沒有人深入討論過。為了拉近劉知幾和我們今人的距離，下面我想以他的字（子玄）來稱呼他。

熟悉《史通》的讀者都知道，這雖然是一本史學名著，但書中竟有不少子玄的自傳成分。比如，書中卷十的〈自敘〉篇，整篇都在寫他自己。再如書中自序一開頭的那幾句話：

長安二年〔702〕，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指中宗〕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

²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校點本），卷10，〈自敘〉，頁268。

兼修史皆如故。³

這裡有極明確的年代，詳細清楚地交代了任官經歷，由子玄自書，彷彿就像今人求職時所寫的一張「簡履表」，也是我們今天研究唐代史官官歷的一條重要材料，同時也正是兩《唐書·劉子玄傳》的記載所本。

下面我就以《史通》所記的這一些自傳片斷為引子，來深入探討唐前期一個史官的書世界。本文雖然只觸及子玄一人，但文中所論的好些唐代日常生活細節，其實也適用於唐前期整個士人官員階層，因為這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階級。

二、「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

子玄在十多歲時，便開始閱讀深奧的《古文尚書》。後來又讀了《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書。至於「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的各種史書，到他「年十有七」時，他便「窺覽略周」了。可以說，他少年讀書，廣泛而多彩。隔了大約三十多年，到他大約五十歲，他寫成名著《史通》時，便在《史通·自敘》篇中，這樣回憶起他少年的讀書生活，不無幾分得意：

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

³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原序〉，頁1。

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貨，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⁴

這一段話大大有名，在今人著作中經常被引用，藉以說明子玄很小就對史書感興趣。但據我所見，所有現代著作都沒有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大段話。當中猶埋葬著許多珍貴的訊息，極有待我們去挖掘。

我們如果把唐代的書，看成是物質文化中的一種物品，我們當然就要問一系列和書有關的問題：子玄家從哪裡得到這些書？唐代這些史書長什麼樣子？它怎樣在讀書人當中流通傳閱？如果我們能夠逐一解答這些問題，我們也就能破解唐代書籍的一些「謎」，從而也就更能了解子玄和他那個時代的物質文化和日常讀書生活。

首先，我們應當知道，唐代還是個手抄本的時代，所謂的 Age of the manuscripts 是也。雕版印刷術在子玄的時代，可能發明了，但肯定不普及，頂多只用來印刷曆書或佛經。現傳世的幾個樣本，多是單張印刷紙，且時代多為唐後期。⁵唐咸通九年（868）印成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據所知是「世界上第一本印刷書」，實際上是由七張印刷紙粘接而成，還保存了卷軸手抄本的形式。⁶像子玄和他兄長所讀的《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書，以當時的條件，不可能是雕版印刷本，應當都是手抄的。

手抄本有幾個特徵。抄寫是個極耗時、耗力且耗財的冗長過程，製作不易。唐代官方的藏書處，如弘文館、秘書省和集賢院，都備有不少抄書手、楷書手等專業寫手，還有裝潢匠、熟紙匠等工匠，更有校書郎和正字等等校對官員。⁷ 這是有組織的大

⁴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10，〈自敘〉，頁267-268。

⁵ 例見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⁶ 此印刷品在敦煌被發現，斯坦因帶到英國，現藏大英圖書館。彩色影印本和討論見 Frances Wood and Mark Barnard, *The Diamond Sutr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Earliest Dated Printed Book*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10).

⁷ 《唐六典》、《通典》和兩《唐書》的職官志，對這些皇室藏書樓的組織及抄書、校

規模抄書活動，需要國家人力和財力的支援，跟歐洲中世紀的抄經院（scriptorium）相似，非一般家庭所能為。唐代這些藏書樓，在最盛時藏有數萬卷書，都屬手抄本。

現代學者可能會以為，唐代一般讀書人家庭，應當都會藏有子玄提到的《史記》、《漢書》和《三國志》等書，認為這是當時「常見之書」。⁸ 然而，這是一個未經證實的假設。實情恐怕並非如此簡單。唐代一般讀書人家庭，是否會家藏這些史書，目前還沒有發現史料可證，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唐代的貢舉考試偏重文學，不考史書，導致唐代的士人普遍不讀史書（甚至不讀「六經」）。最好的一個例證，當數代宗寶應二年（763）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所說的一段話：

近煬帝始制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工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⁹

在這裡，楊綰追溯唐代進士科考試的內容變遷：從高宗朝起，考試偏重「雜文」，即詩文，導致士人「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既然不考史書，士人「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¹⁰ 子玄本身更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他在《史通·自

書人員的配置，都有詳細的描寫。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見 Jean-Pierre Drège,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1).

⁸ 例如，本文在研討會上宣讀過後，便有在場的現代學者提出這樣的看法。

⁹ 《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影印明刻本），卷640，〈貢舉部·條制二〉，頁7675。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19，〈楊綰傳〉，頁3430。本文所用的二十四史，都屬北京中華書局的校點本，以下不一一注明。

¹⁰ 案「六經」中有至少二經，即《尚書》和《春秋》，明確屬於史書。關於唐代士人和史書以及「三史科」等問題，最清晰的討論見雷聞，〈唐代的「三史」與「三史科」〉，《史學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32-42。在子玄的時代，還沒有「三史科」。此科的設立相當晚，遲至唐後期的長慶二年（822），見雷聞，頁41。

敘》中這樣告白：

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¹¹

連他對史書那麼感興趣的人，到了「求仕進」考試時候，也不得不暫時放下心愛的史書，「未暇」顧及。那麼其他士人對史書的冷淡，或可想見。¹² 在這種風氣下，我們不禁要問：一般士人家還會花費人力財力去抄寫收藏《史記》、《漢書》這些大部頭的書嗎？

所以，在這大背景下看，唐代會收藏這些史書的人家，恐怕很少，恐怕都有特殊的因由。子玄一家藏有《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應當是比較不尋常的，應當跟他家中的史學傳統有關，因為他正好有一位從祖父劉胤之（活躍於 620-658），曾在唐宮中的史館當過史官。

子玄家中的這些書，當然可能傳抄自跟他相同或相似背景的其他士人家庭。但從子玄的家世看，另一個更可能的來源，則是他的這位從祖父。劉胤之的《舊唐書》本傳說：

永徽〔650-655〕初，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奏上之，封陽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為楚州刺史，卒。¹³

這段話的大意是，劉胤之在永徽初年，「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並且跟「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人，「撰成國史及實錄」。我們從其他史料知道，國史和實錄是兩種不同的史

¹¹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10，〈自敘〉，頁268。

¹² 就我們所知，唐初只有弘文館和崇文館的學生在修習《史記》、《漢書》等書，而且只限於某些有興趣的學生，作為一種「選修」科目，並非所有弘文館和崇文館的學生都須修讀。弘文和崇文生也是一批很特殊的學生，屬皇族貴胄和高官子弟，跟一般的士人不相同。見李錦繡，〈試論唐代的弘文、崇文館生〉，《文獻》，1997年第2期，頁71-85；後收入她的論文集《唐代制度史略論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頁240-255。

¹³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90上，〈文苑上·劉胤之傳〉，頁4994。

書。實錄通常是在某個皇帝死後，才為他的那一朝編修的，如《太宗實錄》、《武則天實錄》等等，主要材料為起居注、日曆和時政記等。唐代的習慣，是每隔幾個皇帝之後，便會把那幾朝的皇帝「實錄」彙整起來，這便成了當時的「國史」。¹⁴重要的是，這兩種史書都是在唐代的史館中完成的。劉胤之既然和另兩人「撰成國史及實錄」，這便表示，他們三人都是史館史官，而且是一種新型的史官，都具有使職身分，非一般的傳統史官，如起居舍人或起居郎等。¹⁵唐史館的所在地，雖屢有改變，但始終都在宮禁宮城的範圍，不是在一般政府衙署所在地的皇城。它不但是唐代實錄、國史的編撰地點，而且更是實錄、國史和其他前代史書收藏的地點。¹⁶

所以，劉胤之在擔任史館史官那些年，肯定有不少機會，可以接觸和閱讀這些史書。他甚至可以就在史館內，親手或請館中的抄書手，把他所想要的各種史書，各抄寫一部，然後帶回家去作為私人藏書來收藏。實際上，比劉胤之稍後一點的唐史館史官韋述（活躍於 717-757），年輕時在唐秘書省（「秘閣」）編錄經史子集四部書時，便曾經有過這種「光明正大抄書」的行為，且為正史所記載，頗有「表揚」他抄書如斯勤快，如此有恆心之意，當為實錄。這是極佳的一個旁證，證實唐代皇家的藏書，在某些

¹⁴ 唐代實錄和國史的編修過程，最詳細的論述見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19-187. 此書有中譯本，見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06-165。

¹⁵ 研究劉知幾和唐代史官的學者，過去似未察覺唐代的史館史官其實不是一種「職事官」，而是一種「使職」（像節度使那樣的使職）。清代的錢大昕，早就指出「史館史職」為「使職」，見《廿二史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排印本），卷58，〈舊唐書二·職官志〉，頁849。可惜現代學者沒有注意到錢大昕的先見，一直都把唐史館史官當成職事官來研究，模糊了焦點。所以，我把這種使職性質的唐史館史官稱為新型史官，有別於傳統史官（起居舍人等職事官）。詳見賴瑞和，〈唐史臣劉知幾的「官」與「職」〉，收錄於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13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頁138-150。關於唐代「使職」和「職事官」的詳細論述，見賴瑞和，〈再論唐代的使職和職事官——李建墓碑墓誌的啟示〉，《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4期，頁165-213。

¹⁶ 最詳細的討論見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頁65-76。

情況下，是可以被抄錄帶回家去作私人收藏的：

述好譜學，祕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皆畢。¹⁷

這段文字，對研究唐代書物質文化的學者來說，含意和細節都非常豐富，值得詳考。「常侍」指散騎常侍，是個閒散的高官。柳沖是唐代有名的姓系譜學專家。《姓族系錄》其實不是他一人獨撰，還有其他學者的幫助。他的《舊唐書》本傳說：「至先天初，沖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¹⁸ 可知韋述所抄寫的這本大書，竟也跟子玄大有關係。書多達二百卷，算是巨著。如果以唐代書冊的卷軸制度來看，一卷書通常做成一個卷軸。二百卷就等於二百個卷軸，整個體積相當龐大，放在書架上也要佔去許多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韋述在祕閣工作時，「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這句話的意思是，韋述「在完成分擔的工作之餘親手抄錄」。換句話說，他是在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完之後，才來抄書，而且是親手抄寫，不去挪用祕閣中的那些抄書手。這句話的重點似乎，是，韋述沒有以公濟私。他公私分明得很。至於他抄書所用的紙，是公家的？還是他自己帶來的？我們倒不得而知。

「暮則懷歸」這句話，有點模稜兩可，可以有兩種解讀。一是說，韋述到了日暮時分，把《姓族系錄》帶回家抄寫。這正是《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的讀法，把此句翻譯為白話：「晚上就懷揣回家抄錄。」¹⁹ 在唐代書籍的卷軸制度下，這是可能的，因為韋述其實不須把整部書的二百卷都帶回家。他只要每天把他想要抄寫的那一兩個卷軸帶回家就可以了，第二天再帶回來歸還。一兩個卷軸不難「懷歸」。

¹⁷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02，〈韋述傳〉，頁3183。

¹⁸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89下，〈儒學下·柳沖傳〉，頁4971。

¹⁹ 黃永年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卷102，〈韋述傳〉，頁2630。

不過，我認為這種讀法不妥。因為第一，唐代的秘閣藏書，有一套管理辦法，恐怕不容許這種「暮則懷歸」館中藏書的行為。第二，如果真的能夠「懷歸」，又何必等到日「暮」？韋述在工作完畢後，就可以把卷軸帶回家去抄寫，似乎不必留在秘閣抄寫到日「暮」時分。所以，我認為，這裡的意思是，他在日暮時分，把他當天（極可能是在下午）自己親手抄好的那一部分寫本「懷歸」而已。

這樣的解讀也符合唐代官員的上班時間。我們知道，唐人的辦公時間遠比我們今天短，大抵是「日出而視事，既午而退」，中午在各自的衙署吃過午飯（即「會食」）便可以下班回家了。²⁰韋述何以有「分課之外」的時間？這恐怕是指他在中午會食過後，從下午到日暮那段下班時光。這樣才能充分解釋，何以一個唐代的官員，可以有「分課之外」的時間來抄寫皇家藏書。也可以解釋，何以韋述要逗留到日「暮」時分，才把他一天的抄寫成果「懷歸」。

「如是周歲，寫錄皆畢」這句話，透露了中古唐代書籍的獲得是如何不容易。一部兩百卷的大書，要花大約一「周歲」才能寫錄完畢。唐代官員的休假日頗多，一年大約有七十多天。²¹我們不知道韋述是否在假日也到秘閣去抄書。但扣除這些假日和他每十日一次的旬休，粗略估算，他平均每天只能抄寫一卷書左右。

唐代每個人的抄寫速度如何？我們沒有史料。但《梁書·袁峻傳》記載了一個中古時代抄書的故事，提供一些很有趣的細節：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²⁰ 見賴瑞和，〈論唐代官員的辦公時間〉，《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4期，頁73-77。

²¹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431-432。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²²

袁峻「家貧無書」，只好「從人假借」書來抄寫。這恐怕就是中古時代，讀書人非常普遍的得書辦法，家貧者更是如此。袁峻還規定自己每天要抄寫五十張紙，達不到這個紙張數，「則不休息」。由此看來，五十張紙大約是一個人每天所能抄寫的一個極限，但恐怕只有像袁峻這樣用功的人才能做到，一般人難以辦到。袁峻後來的仕途不錯，做到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等清要高官。這雖然是梁代的事，但相信唐代的抄書速度，應當和梁代的沒有什麼不同。

「五十紙」又意味著什麼？這是一個計算的單位，顯示中古時代抄書，用的都是一張一張的散葉紙，並非以做好的長卷來抄書。袁峻每天寫完這五十紙後，他有兩個選擇：一是把這些散葉紙粘接成一個長卷，二是他可以不粘接成長卷，就任這五十紙依然保存在單張單葉的形態。

我們一般都說，中古時代的書為卷軸式。這當然有根據，如唐代的宮廷藏書，在書目文獻的記載都說是若干「卷」，且有詳細的形制描寫，如《唐六典》記集賢院的藏書：

四庫之書，兩京各二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經庫書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彫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別。²³

這裡詳細描述唐集賢院的藏書，連用什麼顏色和材質的軸，諸如經部書用「鈿白牙軸」，子部書用「彫紫檀軸」，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顯然是卷軸式，沒有問題。唐代更有所謂的「投卷」干謁風氣。士人紛紛把自己所寫的詩文，製作成卷軸式，投獻給顯要人

²² 唐·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49，〈文學上·袁峻傳〉，頁688。

²³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陳仲夫校點本），卷9，〈集賢殿書院〉，頁280。

士，以求在官場上得到提拔。²⁴但唐代一般讀書人平日所讀的書，像子玄年少時所讀的那些史書，是否也要做成卷軸式，倒是一個頗成疑問的課題，值得再探討。

至少，我們有一些證據，顯示唐人平日讀書，特別是小孩或少年讀書，用的可能不是卷軸式的書，而是還沒有粘接成長卷或製作成卷軸的單張書頁。例如，唐代呂才為王績詩文集所寫的序，便這樣描述王績小時候讀書的一個細節：

君幼歧嶷，有奇思，八歲讀《左氏春秋》，日誦十紙。²⁵

這裡用「十紙」一詞，顯示王績讀書，用的是散張的「紙」，是還沒有粘接成「卷」的一張一張紙。看來他所讀的這部《左氏春秋》，並非卷軸式，而是以散張單葉的形式存在。他「日誦十紙」，則隱含讚美之意，表示他讀書用功，每天日誦多達十紙，是一個極限，一般學生可能做不到。

此外，王績讀的這部《左氏春秋》，很可能並非完整的書，而是他自己或家人為他抄寫的《左氏春秋》的某些部分，某些他感興趣，或某些他家能夠抄寫得到的部分。這樣的日用書，當然不必講究裝裱，似乎沒有必要做成卷軸，就讓它以最原始的散葉形式來使用，不是更方便，更實際嗎？

唐代小孩讀書，用的是散張紙手寫成的書，我們甚至還「有詩為證」。唐才子詩人杜牧有一首詩〈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說：

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
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
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²⁶

²⁴ 「投卷」是唐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課題，論著頗多，不俱引。最新的一本專書是王侗，《唐代干謁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

²⁵ 唐·王績撰，金榮華校注，《王績詩文集校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王無功文集序〉，頁3。

²⁶ 唐·杜牧撰，陳允吉校點，《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杜牧希望他的「小姪阿宜」，將來長大後讀書，「一日讀十紙」。這跟呂才描述王績八歲讀書，「日誦十紙」，真是太巧合了。看來，「十紙」是唐代一個用功學子每天讀書應當可以達致的一個理想高標準。杜牧此詩還提供了一個很富啟發的細節：「一月讀一箱」，顯示這些「紙」，正因為是散張形式，容易散失，所以要特別收藏在一個「箱」子裡頭。唐代卷軸書的收藏方式，一般說是「插架」，如韓愈詩〈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²⁷

唐代史料中，未見有把卷軸書收入「箱」中的記載。

事實上，為什麼中古時代，書一定要做成卷軸式呢？難道書不能是散葉的嗎？散葉的書，難道就不是書嗎？我認為，唐代的書，劉知幾時代的書，在皇家、私人藏書家收藏時，主要為卷軸式，但在日常應用（如學童讀書）的場合，則極可能是散葉式的。

卷軸式是大家熟悉的。這種形式的書，有相當多的實物證據，如大批敦煌卷子和日本一些佛寺所藏的佛經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存絕大部分唐代傳世的卷軸書，都是佛經，如敦煌卷子 S.351《大寶積經》等等。從這些卷軸佛經和唐代的史料描述，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得出一條大規律：在唐代，凡是做成卷軸的書，必定是比較珍貴的，比較受到重視的。皇家收藏的書，投資了大量人力物力去抄寫，當然最後要做成卷軸。佛經是宗教文獻，抄寫往往是一種做功德的行為，為慎重其事，所以一般都都做成卷軸，流傳至今。

這種因為珍貴，因為要慎重其事，而把書或個人詩文製作成卷軸形式的大規律，在唐代士人間常見的所謂「行卷」之風中，

1，〈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頁9-10。

²⁷ 唐·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12，〈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頁1272。

更可以清楚見到。例如，韓愈當年向陳京投獻詩文，附了一封信，信中最後一段這樣說：

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²⁸

韓愈把〈復志賦〉等十篇作品抄錄成「一卷」（想必是精心抄錄），而且此一卷還是「有標軸」的，表示他是如此看重投卷這件事，想以最美好的卷軸來打動陳京的心。但他的另一篇作品〈送孟郊序〉，卻只以「生紙寫」，而且「不加裝飾」，看來是沒有做成卷軸，還保留在散張紙的狀態。有一個可能是，韓愈是在製作完〈復志賦〉卷軸後，才寫成新作〈送孟郊序〉，來不及納入卷軸內了。新作的用紙不佳，而且還有「揩字注字處」，也就是有塗改加注之處，不是個謄清本子。

韓愈為什麼用「生紙」？其深層含意是什麼？宋人邵博的《邵氏聞見錄》有一解：「唐人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²⁹為此，韓愈深感不好意思，只得跟陳京說抱歉：「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從這種種細節看來，唐代行卷的標準禮數，應當是先把自己的作品抄寫好後，做成卷軸，才能投獻，否則就是沒有禮貌。韓愈為此無禮提了一個理由，說是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韓愈為什麼要「急於自解」？因為他上回見到陳京時，陳京對他面露輕視之色，說話聲音很小（「邈乎其容」，「悄乎

²⁸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與陳給事書〉，頁191。

²⁹ 宋·邵博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8，頁218。現代學者認為，「生紙」的意思是「未經加工磨光上蠟等手續的原紙」，跟加過工的「熟紙」相對。見後魏·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卷3，〈雜說〉，頁173，注2。

其言」)，韓愈碰了個釘子。他於是寫這封信，并「急於」投獻自己的詩文近作來「自解」。

我們好奇的是，重新把自己的作品謄寫一遍於熟紙上，做成卷軸，有這麼難嗎？看來這在唐代的確不是一件易事，或許這還涉及製作卷軸所需的人工、技術、材料和時間等等問題。這也可為唐代學子讀書，其實只要有散葉即可，不須做成卷軸，多一旁證。於是，韓愈只得甘冒無禮之險了，以散葉的〈送孟郊序〉投獻。幸好，他所投的〈復志賦〉等作品，倒都「卷有標軸」，應當多少可以為他挽回一點面子。

我們之所以經常把唐代的手抄書本，跟卷軸本聯想在一起，主要是因為敦煌出土了大批這類卷子寫本，很少見到單張散葉。再加上傳統書目如兩《唐書》的藝文志，也都以「卷」作單位，來著錄各書的篇幅長短。這些都使得我們一想到唐代的書，就想到卷子或卷軸式。

然而，王績八歲讀《左氏春秋》，「日誦十紙」。杜牧希望他家的阿宜，「每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這些例證顯示，唐代的書，到了日常生活的場合，到了小孩讀書的場合，或到了非典藏或非莊重的場合，很可能不是卷軸式，而是散葉式。

散葉式其實就是卷軸式的前身，是更簡單的形式，是一張張寫紙還沒有粘接成卷子之前的樣子。小孩讀的日常用書，抄寫後就讓它保留在散葉的狀態，不但省事，而且更方便閱讀和前後隨意查檢（特別是字書、韻書類），似乎沒有必要再費功夫去把一張張散葉紙粘接成卷子。如果說散葉書不便於收藏，容易散失，那就模仿杜牧家，把這樣的書收在一個「箱」子中，不也就解決問題了嗎？

前台北故宮知名的書目版本專家昌彼得老師（約三十年前，我上過他的課），寫過一篇深刻、生動的論文叫〈唐代圖書形制的演變〉，可惜知音人似乎不多。現代討論唐代圖書形制或手抄本文化的學者，好像都沒有留意到此文。昌老師的研究發現，唐代其實也有散葉的書，不全是卷軸。他特別指出：

大約自貞觀以後，還有一個特異的現象，即和尚誦經，每每以通若干紙來計數，這類例子，見載於道宣《續高僧傳》及贊寧《宋高僧傳》中的，不勝枚舉，與所記唐以前的僧人讀經以卷計不同。又唐朝自至德元年（七五六年）以來，白衣出家，須經過考試，以能背誦佛經若干紙，始許剃度（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及四十二）。若干紙固然不能說就是葉子本的若干葉，不過與「葉子」制的通行，恐怕很有關係。唐代的「葉子」，大概是由釋典首先採用，而後漸及於其他書籍。³⁰

這裡所謂「和尚誦經」，查《續高僧傳》等書，是指和尚外出為公眾誦經做功德一類，屬於日常生活的應用範圍。他們在這樣的場合，使用散葉式的佛經，看來極符合常理。想想看，卷軸式的佛經，想必要請經生精心抄寫，又精心裝裱成卷軸。這樣精美的卷軸書，是為了收藏，但和尚出外為人誦經，實在不必帶這樣珍貴的卷軸出去，不但不方便，恐怕還有傷及卷軸佛經的危險。所以，他們只要把當天要誦的經文，抄寫成散葉，豈不更易隨身攜帶，也更便於翻檢使用？這跟現代大學生上課，有時為了避免攜帶那些六七百頁的笨重教科書，乾脆影印當天要讀的那一章或那數十頁，帶到課堂一樣。更妙的是，和尚誦經，恐怕有一定的經文段落，那些最受「歡迎」的部分。和尚只要把這些最常用的部分，抄成散葉便可以了，而且以後還可以重複使用。

同理，唐至德元年以來，「白衣出家，須經過考試，以能背誦佛經若干紙，始許剃度」，也屬於日常生活的應用場合：熟讀經文，以便可以剃度。這跟王績八歲求學，「日誦十紙」，或杜牧希望他家的阿宜，「一日讀十紙」，以便將來考試，「取官如驅羊」，同屬日常學習活動，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唐代的書（包括佛經），並不一定要以卷軸的形式存在。它可以是散葉式的。散葉式的書甚至更方便閱讀，更便於查

³⁰ 昌彼得，《版本目錄學論叢》（一）（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頁131。

檢。

當然，這樣可能又會引起一個定義的問題：唐代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散葉書，算不算「書」？我認為，不但算，而且更能彰顯唐代日常書的實際面貌。換句話說，唐代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書，不但是散葉的，而且很可能還經常是「不完整」的書，只是完整原書的一部分，只是某些使用者想要讀的某些卷或某些部分。這才是「活生生」的書，跟皇家藏書樓中「有卷有軸」的「收藏書」正好成對比。

子玄在上引的《史通·自敘》中，有一句話對我們現代學者很有啟發意義。他說他少年時代「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假賃」得來的書，就要是「部帙殘缺，篇第有遺」的？我們今人向朋友或圖書館借書，都能借到完整的全書，不致於「殘缺」。為什麼在子玄的時代就不能？可知子玄那時代「假賃」得來之書，恐怕多是如此，原因就在於這些不是公私藏書樓的完整本，而只是民間通行的日常手抄書，而且很可能都抄在散葉上，未裝成卷軸，也多不完整。由此看來，子玄少年平日所讀之書，正因為是向別人借來的家常本，所以也多是「部帙殘缺，篇第有遺」，多是不完整的手抄書，也就毫不出奇了。否則，我們很難解釋，何以借來的書，就要是「部帙殘缺，篇第有遺」的？但這沒有防礙他的學習。他仍然「粗知」書中「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他這幾句話，說得不免有些少年得意，但也無意中生動反映了他那個時代手抄書的某些特色。

中古時代手抄書常非完整本，常有「殘缺」這點，其實也正好反映了手抄本文化的一大特色。因為抄寫一部書很不容易，特別是卷帙龐大者，於是大家都採取了「取巧」的辦法，只抄寫他想要讀的哪一部分，以致同一本書，在流通時就常會有卷數不同，內容不同的問題。中國傳統的書目版本校勘學，如宋代著名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不正是經常在討論和試法解決這一類的問題嗎？

上面提到梁代那位家貧抄書的袁峻，就顯然曾經用過這種「取巧」的辦法來抄寫史書。他的《梁書》本傳有小一段記載，對於我們研究中古時代民間的抄書習慣，很有啟發意義：

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³¹

這裡是說袁峻後來以員外散騎侍郎的本官，到「文德學士省」去當直。所謂「文德學士省」，即梁朝文德殿附設的學士省，是一種宮廷文館，類似唐代弘文館。《梁書·到沆傳》告訴我們：「〔梁〕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到沆〕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³²從此段描寫，我們得知這個學士省是有藏書的。到沆的工作之一，便是校訂典籍。袁峻和他差不多同個時代在這個學士省待詔。他就在這個學士省服務時，藉那裡藏書之便，「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

然而，我們知道，《史記》、《漢書》都遠遠不止「二十卷」。《史記·太史公自序》說：「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³³現傳世的《史記》都是一百三十卷。班固的《漢書·敘傳》則說：「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³⁴現傳世的《漢書》亦都是一百卷。但為什麼袁峻每種都只抄「各為二十卷」，大幅縮減？

顯然，中古時代的抄寫不易。如果要抄寫完整的《史記》和《漢書》，不僅需花費龐大的人力，還得考慮到大量紙張的購置取得。個人的抄書行為，無法像宮廷的抄書那樣，可以不計工本。

³¹ 唐·姚思廉，《梁書》，卷49，〈文學上·袁峻傳〉，頁689。

³² 唐·姚思廉，《梁書》，卷49，〈文學上·到沆傳〉，頁686。

³³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30，〈太史公自序〉，頁3321。

³⁴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100下，〈敘傳第七十下〉，頁4235。

限於人力物力，袁峻只好「選擇性」地抄寫，只抄寫他想要的部分，把《史記》和《漢書》各「刪節」「為二十卷」。這應當是供他自己使用的「濃縮本」、「精華本」、「個人版」。

袁峻這個案例，雖然是梁代的，但我相信，這不單是梁代，而是整個中古時代（包括唐代）很常見的民間抄書方式。試想，像袁峻那樣愛讀書的人，甚至做到了宮廷高官，都可能因為能力問題，不得不用「節省法」來抄書，其他人可想而知。這也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子玄「假賃」得來的那些書，會「部帙殘缺，篇第有遺」。這種「殘缺」，當然有可能是書在流通時因保管不善，或因過度使用等因素造成，但更可能的是，當初抄寫時就抄得不完整，正像袁峻抄《史記》和《漢書》「各為二十卷」那樣。

綜上所論，當我們想像子玄少年讀史書，我們應當意識到，他用的這些手抄讀本，可能不是卷軸式，而是散葉式。至於這些書的最初來源，一部分比較稀見的史書（特別是「皇家實錄」），應當跟他的從祖父劉胤之有關，來自宮廷的藏書樓，特別是弘文館和史館。這些或許是比較完整的。但也有相當多書，則正如他自己所說，「多因假賃」，而「部帙殘缺，篇第有遺」。

三、「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

劉胤之去世的年代不詳，但顯慶中（約 658 年）他還活著，不久因為年老，「不堪著述，出為楚州刺史，卒」。子玄生於龍朔元年（661）。他十多歲開始閱讀這些史書時，離他這位從祖父還健在的老年時代，其實並不遠，只不過隔了大約十多年左右。他絕對很有可能讀到他從祖父當年從史館抄出來的這些史書，或當年原抄本的重抄本、翻抄本。

我的這個說法，對許多現代讀者，對那些只閱讀現代印刷書本的人來說，或許不容易體會和欣賞。但熟悉中國中古時代書籍流傳和寫抄本傳統的書目版本學家，應當都很有同感。想想看，在唐代那個沒有圖書出版市場，沒有完善書肆的時代，一個人要怎樣去得到像《史記》和《漢書》那樣的書籍？當然要靠抄寫，

而抄寫、複製這些史書的最佳地點，莫過於唐代的史館或弘文館了。

細考唐代有名的私人藏書家，幾乎全都是史館史官。其中最知名的，包括跟子玄同在史館任過史官的吳兢。他的《舊唐書》本傳說他「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這是說，吳兢甚至還為他家的藏書編了一本目錄，也是我們所知中國最早的私家藏書目錄之一。我們從其他資料知道，吳兢家的藏書多達「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³⁵另一史官韋述，也「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³⁶唐後半期的史官蔣乂，「家藏書至萬五千卷」。³⁷這些史官家中的豐富藏書，相信有許多是從宮中藏書抄出。³⁸

劉胤之任史館史官時，他帶有的兩個官銜（「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也頗耐人尋味。我們現在知道，唐代的史館史官是一種使職，像翰林學士等館職一樣，沒有品秩，所以照例帶有一個所謂的「本官」。³⁹ 劉胤之任史館史官所帶的本官，就是「著作郎」，但他的另一個官銜「弘文館學士」，卻不是本官，而是另一個使職。換句話說，從他的《舊唐書》本傳看來，劉胤之在永徽年間，同時帶有兩個使職：既是史館史官，又是弘文館學士。這點並不出奇。唐代一個官員是可以同時擁有多個使職的。最知名的案例，莫過於天寶年間，楊國忠同時獨攬四十多個使職的事。

劉胤之任弘文館學士，意味著什麼？當然意味著他除了史館的藏書外，還可以同時接觸到弘文館的藏書。早在唐初，弘文館就是唐宮中一個極重要的藏書處。《唐會要》卷六十四有一段詳細記載。這裡只引開頭幾句：

³⁵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影印清乾隆年刻本），卷207，〈經籍考三十四〉，頁1710。

³⁶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102，〈韋述傳〉，頁3184。

³⁷ 北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32，〈蔣乂傳〉，頁4533。

³⁸ 關於唐代私家藏書的一般狀況，見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頁38-51。

³⁹ 見賴瑞和，〈唐劉知幾任史館史官的使職身分〉。

武德四年〔621〕正月，于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626〕三月，改為弘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闡文教，於弘文殿聚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⁴⁰

「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是個不小的數字。⁴¹ 到「儀鳳〔676-678〕中，以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之」，可知此館藏書之豐富。所以，我推測，子玄年少時在家中所讀的那些史書，如果不是抄自史館，就是源出弘文館。兩者原本都屬宮中藏書。順此一提，到了景龍二年（708），子玄本人更步他從祖父之後塵，也來到這個弘文館任學士。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子玄〈自敘〉中還提到一種很讓現代唐史學者不禁都要「砰然心動」的書，那就是「皇家實錄」這種書？而且他竟然還說他「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說得好不輕鬆，真羨煞我們這些從來未有機會讀到「皇家實錄」的學者。⁴²

什麼是「皇家實錄」？唐人所說的「皇朝」、「皇家」，指的都是他們的本朝，也就是唐朝，在唐史料中屢見不鮮，特別是在墓誌。「皇家實錄」就是唐本朝的實錄。子玄「年十有七」，「窺覽略周」這些「皇家實錄」時，大約是在高宗上元、儀鳳年間的事。這時，唐史館已經編成的實錄還不多，大約就是《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兩種。

問題是，這種《實錄》不就是史館史官所編的嗎？而且就收藏在史館（當然可能也有副本在弘文館等宮廷藏書處）？子玄怎麼能得到這樣的《實錄》，這樣的禁中之書？顯然，答案是呼之

⁴⁰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校點本），卷64，〈宏文館〉，頁1318。

⁴¹ 但李德輝質疑這個數字，認為唐初不可能有如此多的藏書，「二十餘萬卷」可能是「二萬餘卷」之誤。見他的《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91注1。筆者非常同意此說。但二萬卷在當時也是個不小的數字。李德輝此書對唐代幾個文館的藏書狀況和演變，特別是弘文館、崇賢（崇文）館和集賢院，有非常清楚的分析 and 討論，遠勝許多唐代圖書史的論著。

⁴² 唐代的這些「皇家實錄」，現已都不傳，除了《順宗實錄》收在韓愈的文集之外。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考異》部分，引用過不少唐代實錄，讓我們得以一窺片斷。

欲出的了。應當得自他家那位曾任史館史官的從祖父劉胤之。否則外人哪來那樣的本事，可以把宮廷的《實錄》帶到外頭？所以，這又多了一個有力的旁證，可以佐證我前述的推測，子玄所讀的《史記》等史書，應當也源自劉胤之。

一般人的印象，以為唐代的實錄為皇帝之書，門禁必然森嚴，不可能流出宮外。實際上可能並非如此。我們從其他材料知道，唐宮中的實錄是可以被抄寫，被複製的。《唐會要》有一段記載：

貞觀十七年〔643〕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祕閣。并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⁴³

「仍遣編之祕閣」，指實錄除了收藏在史館，也寫錄副本，藏在「祕閣」（指秘書省藏書樓）。此外，「皇太子及諸王」亦都各得到一部實錄手抄本。「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似乎相當嚴格，只有三品高官才能抄錄。但不難推想，皇太子、諸王和三品京官得到這些實錄的手抄本之後，很可能又假借給其他人重複抄寫，從而使唐皇朝實錄四散於人間。

藤原佐世（約卒於 897）奉敕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約完成於日本寬平初年（885-891），著錄了九世紀前傳到日本的漢籍一千八百餘種。其中便列了三種唐代實錄：

《唐實錄》九十卷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等撰

《唐實錄》九十卷中書令許敬宗撰

⁴³ 宋·王溥，《唐會要》，卷63，〈修國史〉，頁1289。

《高宗實錄》六十卷武玄之撰⁴⁴

可知唐皇朝實錄，早在唐代就已經流出宮外，甚至遠傳到了日本。⁴⁵

綜觀子玄生平，他幾乎一生都在跟書打交道。從他「年在執綺」到他「年十有七」，他便遍讀飽覽了他之前各朝的史書，更讀過他本朝的「皇家實錄」。他的閱讀是廣泛而多采的，遠遠超出當時一般士人的閱讀範圍。但他這種不凡的閱讀生活，這種精神生活，是建立在一個不尋常的物質條件上的，那就是，他家有一位曾任史館史官的從祖父，因而能夠輕易得到那麼多的書，特別是「皇家實錄」。

子玄這個案例，或許也能幫助我們了解，何以唐代的史館史官，多有「家承」的傳統：不是父子相傳，就是祖孫隔代相繼。子玄一家便是個好例子。他的從祖父劉胤之任史館史官。他自己任史官。他的兩個兒子劉貺和劉餗，都先後當過史官。⁴⁶ 再如蔣乂、蔣係、蔣伸和蔣偕，更是父子相繼任史官。⁴⁷ 說穿了，史官的培養，不僅要靠個人的天賦，更得建立在一個非常現實的物質基礎上。在他們年少時，他們就得像子玄那樣，涉獵大量的史書，才能打下深厚的史學修養。否則，再多的天賦恐怕也不免成空談。但中古時代，書籍的獲得不易。那些家中有長輩在史館任史官者，當然佔盡不少「物質優勢」。

四、「公私借書，恣情披閱」

子玄早年讀書生活當中，有一個恆常的主題，就是他經常跟

⁴⁴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清光緒《古逸叢書》本，又影印在台北藝文印書館的《百部叢書集成》），頁16-17。

⁴⁵ 池田溫，〈唐朝實錄與日本六國史〉，《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下冊，頁717。對此有進一步的討論。唐代實錄（以及國史）如何流出宮中，我還有更多例證，有趣而複雜。但這裡為免枝蔓，不擬詳考。我想將來另文處理。

⁴⁶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02，〈劉子玄傳〉，頁3174。

⁴⁷ 徐夢陽，〈唐代史官：以蔣乂父子為個案〉（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又見張榮芳，《唐代史館與史官》，頁194-212。

人借書。

前面我們見過，子玄年少時讀史書，「其所讀書，多因假賃」，以致「部帙殘缺，篇第有遺」，透露當時他讀的書，多是借來的，而且正因為是借來的，一般不佳，多處於「殘缺」的狀況。

子玄在準備進士考試的一段時候，曾經不得不暫時放棄他心愛的史書，轉而用心準備考試，以求功名。直到他考中進士後，他才能盡情放任他的所好，「公私借書，恣情披閱」，過著好幾年逍遙的讀書生活。他自己的說法是：

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⁴⁸

這段話可詳考的重點是：「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這句話。這究竟是怎樣的背景和環境？歷來研究子玄的著作，包括傅振倫的《劉知幾年譜》和許凌雲的《劉知幾評傳》，都未論及此事。

我們知道，「京洛」指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子玄「公私借書」，「私」的部分當指他周邊的親朋好友；「公」的部分應該指洛陽和長安的皇家圖書館。子玄二十多歲的時候，正值武則天當政的時代，唐朝廷幾乎大部分時間都駐守在洛陽，很少回返長安。子玄家在洛陽歸德坊有宅第。⁴⁹看來，他借書所依靠的，主要是洛陽的皇家圖書館，而不是長安京城的。

子玄自敘的這個細節，也彰顯了唐代好學之士，是如何仰賴「公」家圖書館。唐代士人讀書考科舉，所需要的用書其實並不多，應當都不需要動用到皇家圖書館。但像子玄那樣不滿足於單純讀書考取功名，而有志於史學著述的人，皇室藏書便佔有舉足

⁴⁸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10，〈自敘〉，頁289。

⁴⁹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修訂版），卷5，〈東京·外郭城〉，頁308。

輕重的地位了。這其實就跟我們現代人文學科的學者，十分仰賴大學或研究院的圖書館一樣，絕對無法只靠個人或朋友的藏書來做研究寫論文。現代一所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是否豐富，往往更成了我們大學學術地位的重要指標。這一切，在在顯示從古至今，從事著述的學者，莫不十分仰賴「公」家的圖書館。不獨子玄時代如此，現代依然如此。

可惜，我們對子玄怎樣向皇家圖書館借書，一無所知。但唐初有兩個像子玄那樣博覽群書的人，同樣活在高宗武則天朝，卻留下生動的故事，讓我們得知當時一個士人，是如何得以在皇家圖書館中「貪婪」地獲得他所需要的知識。這二人在唐史上都大大有名。

第一個是唐初一位文武雙全的高人裴行儉（619-682）。宋太平興國八年（983）成書的《太平御覽》，引用一種現已失傳的《唐書》：

《唐書》曰：裴行儉初以門蔭補弘文生，累年在館唯閉戶讀書。館司將加薦舉，固辭。左僕射房玄齡問其故。對曰：「遭隋季亂離，私門書籍蕩盡，冀在館披閱，有所成耳。」⁵⁰

表面上看來，這不過是一個「普通」書生在皇家圖書館「閉戶讀書」的故事。但深一層看，裡頭大有文章，值得細考。首先，「裴行儉初以門蔭補弘文生」這句話就不簡單，因為這表示，裴行儉的家世必定相當顯赫。他的父親或祖父必定都是做官的，而且還是相當高層的官員。果然，一查他的《舊唐書》本傳，我們發現他「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定，憑

⁵⁰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據日本皇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卷619，〈學部十三·圖書下·借書〉，頁4。這段記載，不見於今本《舊唐書》。所以，現代學者推測，《太平御覽》編者所見到的《唐書》，跟我們現在使用的《舊唐書》不相同。吳玉貴是這方面的專家，且輯有遺文和校注。見他的《唐書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裴行儉此條見吳書下冊，頁849。

翊郡守，襲封琅邪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⁵¹正因為如此顯赫的家世，他才能托他祖父和父親的「門蔭」，來「補弘文生」，也就是進入弘文館當學生。

弘文館不但是個宮廷藏書處，而且還是一所宮內貴族學校。⁵²裴行儉以門蔭補弘文生，當在十多歲時，也就是在大約貞觀初年。我們前面見過，弘文館成立於武德四年（621），到貞觀元年（627）已有「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裴是弘文館最早的學生之一，在這樣的環境「閉戶讀書」，想是如魚得水，學思猛進。像他這樣的一個學生，竟能得到左僕射房玄齡的關切，顯示他的家世和人脈絕對不俗。他寧願留在館中讀書，不願應「館司薦舉」出去做官，理由竟是「隋季亂離，私門書籍蕩盡，冀在館披閱，有所成耳」。隋末戰火，想必造成相當多的「私門書籍」焚毀，僅有皇室還有餘力重抄歷代書籍。這個弘文館對他的吸引力，竟大於踏入仕途。他後來的仕歷十分輝煌，官至宰相等高官。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永徽（650-655）初，子玄的從祖父劉胤之，就曾出任這個弘文館的學士。再隔大約五十多年，在景龍二年（708），子玄自己也來到這個弘文館當學士。我們不難想像，裴行儉、劉胤之和子玄三人，可能都讀過，甚至都觸摸過這個圖書館中某些相同的手抄本。他們三人應當也都曾經在唐史上的不同時間，行走過這個弘文館相同的館舍迴廊，見過館中相同的建築和樹木。

我們的第二個案例是高宗時代的中書令李敬玄（615-682），跟第一例的裴行儉為同一時代人。他的《舊唐書》本傳這樣描述他如何利用皇家圖書館：

李敬玄，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玄博覽羣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宮，馬周啟薦之，

⁵¹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84，〈裴行儉傳〉，頁2801。

⁵² 李錦繡，〈試論唐代的弘文、崇文館生〉，《文獻》，1997年第2期，頁71-85。

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⁵³

這裡的敘事可以有兩種讀法。一是說「敬玄博覽羣書，特善《五禮》」，所以他在貞觀末年，被召入崇賢館，作為皇太子李治（後來的高宗）的「侍讀」。第二種讀法是，他被召入崇賢館後，近水樓台，於是「仍借御書讀之」，也就是「因此」利用宮廷內的藏書（「御書」），以致他「博覽羣書，特善《五禮》」。「仍」字在此可解為「因也」。⁵⁴在第二種讀法下，「貞觀末」那一句，解釋上一句他何以能夠「博覽羣書，特善《五禮》」。換句話說，他是入了崇賢館，得以「仍借御書」，才「博覽羣書，特善《五禮》」。我覺得第二種讀法比較合理。但不論是哪一種讀法，李敬玄曾經「借御書讀之」，顯示他充分利用了皇室藏書，這應當有助於大大增廣他的學問。

至於崇賢館（上元二年（675）改名為「崇文館」），乃「皇太子文學館，東宮的學術文化中心」，也是初唐的三大文館之一（另一即上面提到的弘文館）。它跟弘文館一樣，招收皇親貴族子弟為學生。⁵⁵在貞觀末（649年或稍前）李敬玄任皇太子的侍讀時，崇賢館坐落在長安的原宮城太極宮（即西內，有別於後來的東內大明宮），東宮宜春門外左春坊之南，擁有本身的藏書，但藏書量可能不及弘文館。李敬玄所借的「御書」，可能來自崇賢館，但也可能來自弘文館，因為弘文館也同樣坐落在西內，離崇賢館不遠。

裴行儉和李敬玄之所以能夠借閱宮廷藏書，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都生在官宦家庭，跟當權的高官有一定的人脈關係，如裴行儉跟左僕射房玄齡，李敬玄跟中書令馬周，都相當熟絡，所以才會有門路進入宮廷藏書樓。至於唐代一般的士人，如果沒有這種人脈，恐怕無緣借閱宮中藏書。但子玄並非泛泛之輩。他跟裴

⁵³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81，〈李敬玄傳〉，頁2754。

⁵⁴ 這點蒙拙文的一位匿名審查人教示，特此致謝。

⁵⁵ 李德輝，《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係》，頁94-115。又見彭炳金，〈墓誌中所見唐代弘文館和崇文館明經、清白科及醫舉〉，《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37-42。

行儉和李敬玄一樣，生在一個官宦之家，父親祖父輩都做官，更有一個從祖父劉胤之在宮中史館任過史官。以他這樣的背景和關係，子玄在青年時代得以「公私借書，恣情披閱」，也就不難理解了。

五、結論

子玄一生，活在一個被書圍繞著的世界。他跟書的關係太密切了。他年少時，便讀過各種各樣的史書，甚至還包括別人難以一見的「皇家實錄」。他考中進士後，從此沒有了考取功名的負擔，更是「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說得好不痛快！接著，他出任河南獲嘉縣主簿。這其實也是個跟書（或說文件）有密切關係的官位，因為主簿專門管紙張，管官方文書檔案的稽察。到他大約四十歲時，他開始回到朝廷出任史官，從此在「館宇華麗，酒饌豐厚」⁵⁶ 的唐代史館中，過著一種專門讀書、寫書的生活。結果，他不但完成了一系列官方的史書，特別是《武則天實錄》等唐代本朝史，而且還寫完了他的私人著作《史通》，中國第一部史評著作，也是他留給我們今人最豐美的遺產。他去世後，唐玄宗特地下令河南府，到他的老家去把他這本《史通》抄錄了一份，帶回皇家藏書樓。⁵⁷ 正因為它曾經被收藏在皇朝圖書館，《史通》等於多了一個流通管道，得以歷經歷代戰火，流傳至今。

本文檢討了子玄時代的書和手抄本，想更深入去理解他當時的寫本文化。細考子玄自傳所提供的一些例證，本文達致了幾個結論。第一，唐代皇家的藏書，固然是卷軸式，但民間日常用書，很可能是以散葉（而非卷軸）的形式存在。第二，正如子玄自述，他當時得到的書，「多因假賃」，而「部帙殘缺，篇第有遺」。這表示，民間抄書，受限於人力物力，常屬選擇性的抄寫，抄得不完整，以致有「缺」有「遺」。第三，子玄家中的藏書，特

⁵⁶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11，〈史官建置〉，頁318。這是子玄對他工作場所一個難得的描寫。

⁵⁷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02，〈劉子玄傳〉，頁3173-3174。

別是比較稀見的「皇家實錄」，可能跟他從祖父劉胤之曾任宮中史館史官有關連。第四，子玄本人青年時代讀書，書籍的取得不易，單靠家中藏書絕對不足，所以他要「公私借書」，才得以完成他以後的史學大業。他家的仕宦背景和他從祖父任過史館史官所建立的人脈關係，使他佔有不少「物質優勢」，不單可以向許多「私」家借書，還得以向藏書豐富的「公」家皇室圖書館借書。

Liu Zhiji and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ang China: A Material Culture Perspective

Lai S. F.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ertain aspects of books and manuscript copies in Tang China, based on certain event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life of the well-known historian Liu Zhiji (661-721), in order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uscript culture in his era. By looking closely into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Liu Zhiji's own account, this paper reaches a number of conclusions. First, the manuscript copies preserved in Tang imperial libraries were mostly in the form of well-made hand scrolls, whereas manuscript copies in everyday use, such as textbooks used by school children, tended to be made and preserved in the form of loose leaves, not hand scrolls. Second, as Liu Zhiji told us, books he could get hold of, those that he borrowed from his friends, were frequently "incomplete in certain parts and chapters." This shows that manuscript books made by his contemporaries, limited by resources, seemed to have been mostly incomplete copies, purposely omitting certain parts and chapters. This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norm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Third, books in Liu Zhiji's own family collection, especially those rar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Tang dynasty," probably came from imperial libraries, perhaps having something to do with one of his grand uncles Liu Yinzi, who had served as a historian in the Tang court. Fourth, when Liu Zhiji was studying as a young man, books were hard to come by and his family collection was inadequate, so he had to borrow books from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ources, in order to build up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his future career as a great historian. The background of his family and its intimate connections with Tang officialdom provided distinct advantages and networks for Liu Zhiji to have easy access to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libraries.

Key words: Liu Zhiji, manuscript culture in Tang China, Tang libraries, knowledge production